

商子答客问



贤哲自述丛书

汤勤福 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

商子答客问

贤哲自述丛书

郭志坤 主编

汤勤福 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远涛
封面装帧 沈兆荣
周剑锋
插图 庞先健
陆 怡

贤哲自述丛书

商子答客问

汤勤福 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5 字数 163,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08-02727-7/K·665

定价 13.50 元

“贤哲自述丛书”总序

才德佼好谓之贤，识见超人谓之哲。在漫漫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难以数计的贤士哲人。他们犹如灿烂的群星，闪烁在万里碧空，犹如擎天的立柱，支撑着华夏民族的大厦。贤哲，我们民族的精华。贤哲，我们民族的骄傲。贤哲，我们民族的象征。我们不能没有这种精华。我们不能没有这种骄傲。我们不能没有这种象征。一句话，我们不能忘祖数典。对每一个中国人——哪怕是最普通的中国人——来说，都有一个了解、熟悉民族的贤哲，并从他们身上吸取精神养料的问题。

这些年来，对贤哲的介绍也不是一片空白。对其人其事作一些浅层的表述，有的还加以某种演绎和图解，这样的作品还不少见。应该承认，这也是有益的，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必要的。但如果仅止于此，就不怎么可取了。对贤哲的人生历程，大事渲染，音容笑貌，绘声绘色，或高，或矮，或胖，或瘦，一一刻画得栩栩如生，那样做，说到底也只是触摸到了贤哲的外在躯壳，至于贤哲的内在气质是没有触及的。那样的作品尽管也可热热闹闹，风靡一时，但对承继民族传统及精华，似乎不相干。

贤哲的内心世界是一座高度学术化的宝库。打开这座宝库，展示这座宝库，把宝库中的一件件学术珍品向世人作

一点介绍、剖析,使人们懂得:哦,我们中国的历史宝库中还有那么多好东西,我们可不能自贱自卑呀!进而学会从这一宝库中吮吸养料,以充实和完善自己。

我们正在着手做的就是这样一件把学术和文化送向民间的工作,让哪怕是只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们也懂一点“学术”。历史上人们每每称道“学术下移”,这,也算是吧!

要让学术深入于民众之中,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适宜而贴切的表述形式。

我们取的是让贤哲自己站出来讲话的“贤哲自述”的形式。

贤哲已长眠于地下千百年,逝者无言,何来“自述”?不,那样看似乎太简单化了些。从肉体角度看,贤哲们已消失,已逝去,起逝者于九泉之下而“自述”之,岂非天方夜谭!然而,贤哲之为贤哲,是因为他们的论著犹存,他们的精神没死。千秋评说,涉足于史海学坛的弄潮儿,总是要唤起先辈贤哲的英灵,来表述自我的心迹的。鉴于此,我们何不将贤哲的英灵请到前台来,让他们“自说自话”一番,详言其身世、际遇、学说、业绩,甚至对后人的千秋评论发表一点“感言”,如此这般,岂非妙哉?!

当然,我们的主旨还在于介绍,但这是浅化学术的介绍,这是深化内涵的介绍,与一般的介绍文字不尽相同的。

既然是“自述”,那么势必要有问有答了,有“客问”,也有“贤哲答”。“客问”提出的是学术界、社会上关切的诸多问题,有些是常年争讼不休的“热点”、“难点”,决非隔靴搔痒。“贤哲答”,实际上是让贤哲超越时空,站在今天读者面前作面对面的答疑,既解答生平、事迹、思想、理论,也可评判历代研究者的种种评说。答疑涉面可以广泛,但都恪守“言之

有据”的原则。所答内容大致上是学界的定评和定论,也有一些是笔者长年研究的心得所在,只是托贤哲之口道出罢了。

在撰稿过程中,我们深感这种将古人“起死回生”的表述方法,对“学术下移”是大有益处的。一是生动、活泼,使历代贤哲直面读者,对读者来说,那是如闻其声,如睹其人了;二是可熔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比起那些单纯的图解和表层的介绍来,要“沉甸甸”得多,称这些文字为“浅化了的学术专著”,不为过。

参与撰写这些“贤哲自述”的,不少是学界的佼佼者。他们深感写这样的文字,比起写那种正儿八经的学术作品来并不轻松,因为那要浅化。浅化是件难事。深入才能浅出。你如果不深入,一味求浅,说不准会将贤哲的鼻子眼睛给描歪了。再说,“深入”了也不一定能“浅出”。“深入”有道,“浅出”有术。这里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表述方法问题,也有驾驭文字的功底问题,于此,几多学术巨擘还自叹“浅出”无方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在学习,正在摸索。当我们把这套丛书一本本地推到读者面前的时候,是否会得到读者诸君的赞许和首肯呢?我们期待着肯定的回答。

郭志坤

1997年5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传奇一生.....	1	
商君姓氏——生卒之谜——法家来源——师承诸说——弃		
魏入秦——变法分歧——徙木立信——处罚傅、师——重		
盾铁钺——官位与封邑——孝公禅让——悲壮结局		
第二章 古今《商君》.....	29	目
研究综述——原始资料——汉代之后成果——民国时期成		
果——近五十年来的成果——书名与篇目——篇数疑		
案——商君在世的篇目——后学所撰文章		
第三章 农战为本	61	
军事生涯——战术方法——战略思想——废除井田——奖		
励军功——爵位答疑——后学农战思想——商鞅与孙武		
第四章 立法治国	95	
建立法治社会——一断于法——刑赏关系——告奸连		
坐——行政改革——秦法未败——焚书质疑		
第五章 时变俗化.....	129	
商君历史观——儒法差异——后人评价——后学观点		
第六章 去强弱民.....	141	
商君去强措施——君尊法严——驱民于壹——令民归		
朴——禁止游学——废善任奸		
第七章 农商平议.....	175	
农商关系——限商措施——后学观点		

第八章 伦理道德.....	191
人性善恶——立法化俗——任力弃德——去智返朴	
第九章 历史功过.....	211
统一基石——农战是非——史观漫评——暴力辨析——刑赏利弊	
附录	
商鞅生平大事年表.....	237
参考书目	238

第一章

传奇一生

商君姓氏——生卒之谜——法家来源——

师承诸说——弃魏入秦——变法分歧——徙木

立信——处罚傅、师——重盾铁杵——官位与

封邑——孝公禅让——悲壮结局

客问：商先生，自从我涉入学术界，您的大名就如雷灌耳。我想请您解答一些疑难问题，以便国人能正确认识您的生平为人、学术思想及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知先生是否可以谈谈？

答问：当然可以。我首先应该表个态，我既不是神、也不是鬼，是一个确确实实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人。从这点出发来交谈，我想才可能比较正确地理解我个人性格、处世行事及思想观点。你们不是强调实事求是吗？我想这可以作为今天我们谈话的基准点。离开这一基准，那么就失去了访谈的意义。

客问：我完全同意先生将实事求是作为基准的观点。不过，我想了解的问题确实太多，为了有个系统，今天的访谈能否从了解先生的生平事迹开始呢？譬如，我的一位朋友曾问我，商鞅究竟姓商还是不姓商，为何各种书上记载不同？有的称先生为“商鞅”，有的称先生为“卫鞅”，也有的称“公孙鞅”。先生能否解答一下？

答问：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解答，不过，这又涉及一些历史方面的知识。我还是从我个人的出身说起吧。我是卫国王室后裔。卫国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的封国，周王朝是姬姓，因此，我原先的姓应该是姬，称我为“姬鞅”是最准确的。司马迁先生在《史记》中有明确的记载，我可读

给你听听：“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这里明确说我的先祖是姓姬，我名鞅，称“姬鞅”当然不会错。我是卫国王室后裔，当时有以国为姓的习惯，称“卫鞅”也对。你可能知道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吧，据说他的祖先是邾国的国君，以国为姓，后来将邾字的“卩”去掉，就成为“朱”姓了。或许你会对“姓公孙氏”四字发生怀疑，为什么又说我姓公孙氏呢？实际上在先秦时期，诸侯后裔可根据自己出生的情况而给以某种称呼的，如是某王的嫡亲长子，而且打算让他继位，那么就称他为“太子某某”，而他的兄弟就都称“公子某某”，而“公孙”则是指原“公子某某”的儿子辈；至于王的妾所生的儿子就称为“庶孽”，因此司马迁先生讲我是“卫之诸庶孽子”，就是说我的父亲原是卫国某王的妾所生的儿子，到我这辈就是“孙子”辈了，因此就称我为“公孙鞅”。而我后来到秦国帮助孝公变法，孝公封我商、於两邑，以所封之地为姓也是当时的一种习惯，因此人们称我为“商鞅”。不过，时日久远，我对自己的父亲是谁也记不清了，史书上也未留下记载，这真是件遗憾的事。

客问：就如先生的姓一样，关于先生的生卒时间，学术界也有不同说法。商先生能否谈谈自己的看法？

答问：当然可以。正像你所说的那样，学术界确实有不同的说法，但主要是两种不同说法。一是以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为代表。钱先生在该书中专门写了一节《商鞅考》，对我生卒时间进行考辨。他推测是：假定我入秦时间为30岁的话，那么我应该超过50岁而不足60岁；

依该书“先秦诸子系年通表”的“附诸子生卒年世约数”载，将我的生年与孟子放在同年，即公元前 390 年，而卒年当然是明确的，是公元前 338 年，那么我的岁数是 53 岁。因此有些著作将我的生年大致定在该年，如邱少华等人所编的《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山东大学编《商子译注》等都是如此，但前面都加个“约”字。第二种如朱师辙先生的《商君书解诂定本》、罗根泽先生的《诸子考索》、蒋伯潜的《诸子通考》、高亨先生的《商君书注译》等书均不提生年。

客问：那么哪一种说法比较准确呢？

答问：钱穆先生的说法当然只是推测之语，不足为定论。实际上，因为时间久远，连我自己也忘了是哪一年生的，因此入秦是几岁也实在记不清了。钱穆先生作些推测当然可以，但作为定论则很难，因此一些著作加个“约”字。至于有些著作肯定我生在这一年，那就完全是臆断了。如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中国法制史》写道：“商鞅（公元前 390—公元前 338 年）”（群众出版社 1982 年版），这不是硬将我生年“确定”为公元前 390 年吗？我认为还是像朱师辙等人不提生年为好，以防以讹传讹。即使一定要说生年，那么不妨按钱穆先生的方法处理，说“约公元前 390 年”。

客问：按先秦诸子的观点来划分，先生当然属于法家无疑，而且先生在法家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但是，蒋伯潜先生《诸子通考》一书指出：法家的名称最早出现在《韩非子》中的《定法》篇。先生对此看法如何？

答问：蒋伯潜先生是研究诸子的名家之一，他的《诸子

《通考》在学术界确实很有影响。蒋先生说《韩非子》中最早出现法家的名称是正确的。因为早于它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两文都提到当时的一些学术派别,然而都没有提到我。在《诸子通考》的“绪论”中谈了先秦各学派名称的来历,指出我国先秦学派名称最早出现在《庄子·天下》中:他将孔子为首的儒家一派称为“邹鲁之士”;称墨翟、禽滑釐一派为墨家;宋钘、尹文为一派,其学也近于墨家;彭蒙、田骈、慎到为一派,其学近于道家;关尹、老聃、庄周均作为道家。这里没有提到我。《天下》究竟是谁所作,历来有不同说法,朱熹认为是庄子之徒所作,而后代学者一般均以为是战国末年人所作。近年出版的张默生先生的遗作《庄子新释》一书认为是庄子本人所作,论证很有力。不过,庄子虽比我稍晚一些,也是当时一位著名的道家思想家,但他弃世不居,与人接触不多,就连孟子也不知道,我当时住在偏僻之地秦国,他老先生怎么会知道我的情况呢?

因而,我以为庄子不提法家之“名”,不能说当时就不存在法家这一学术流派。因为慎到比我略晚,他的法家思想也是比较有特色的,而后人也一致将慎子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再加上我与李悝、吴起等比慎子早一些的法家人物,怎么可以说不存在法家这一学术流派呢?显然,《庄子·天下》篇没有正确地将“法家”一派划分出来,并非当时不存在法家这一学术流派。

至于《荀子·非十二子》中将当时诸子分为六派:它嚣、魏牟为一派;陈仲、史鳢为一派;墨翟、宋钘为一派;慎到、田骈为一派;惠施、邓析为一派;子思、孟轲为一派,实际是区分出儒、墨、道、法、名五家。众所周知,荀子四处游历,见识甚广,又自诩为儒家正统,但他思想中“法”的成分很多,然

而谈法家时不提我，确实是十分可疑的事。

客问：按先生的说法，似乎荀子“法”的思想与您有关，难道荀子的思想中有关“法”的思想来源于先生您吗？

答问：荀子自诩为儒家的正统，当然尽可能将自己的思想来源与其他学派区分开来。但是他越是回避，越露出马脚。荀子没有提起看过我的著作，也从未谈过我的法家思想，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回避不了的，他到过秦国！我虽然被车裂而死，但秦国并没有废除我所创立的法制，我的思想在秦国的影响仍然很大，这在《史记》中已经明确记载了。荀子到秦国难道会不了解我的法家思想吗？会不知道我的观点吗？当然不会！因此，他回避这一问题，正好反证他有关“法”的思想与我有一定关系。我不敢说他的“法”的思想直接来源于我，但说受到我的影响应是毫无疑问的。我举几个例子来证明。如他在《议兵》中提到“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一语，郭嵩焘说：“此与秦首虏之法同”（王先谦《荀子集解》引），这不是明确的证据吗？同文中提到军事家中有“齐之田单、楚之庄跻、秦之卫鞅”等等，这卫鞅就是我。虽然这是他著作中唯一提到我的地方，但是我敢肯定荀子对我的法家思想是比较了解的，他提法家而不提我，只是有所“讳”而已。

客问：一般说来，学有师承。而现存之书对先生的师承问题语焉不详。据我所知，《史记》在您的本传中虽有“少好刑名之学”一语，但并未明确说明先生的师承关系，而两汉之际的桓谭《新论》，首次提到先生入秦时携带李悝《法经》，是否可以说先生私淑李悝呢？

答问：所谓师承，除了亲炙，还有私淑。你说我私淑李悝，只是依据桓谭。当然，李悝、吴起均比我生得早，我不及亲炙。但学问总有个来源，或称师承关系。这在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三《商鞅考》中辨析得比较清楚。（商子拿出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翻到卷三）我读一段给你听听：

商鞅卫人，吴起同邦士。其仕魏，事公叔痤。又甚贤起（吴起）。起之为治大仿李克（李悝）。鞅入秦相孝公，考其行事，则李克、吴起之遗教为多。史称鞅先说孝公以比德殷周，是鞅受儒业之明证也。其变法令，令民什伍相收司连坐，则李克之《网经》也。立木南门，此吴起儆表之故智也。开阡陌封疆，此李克尽地力之教也。迁议令者边城，此吴起令贵人实广虚之地之意也。《汉志》《神农》二十篇，班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颜）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今按重农政，则李悝吴起商君一也。刘氏独不及吴起。重法律，亦李悝吴起商君一也。桓谭《新论》称商君受李悝《法经》以相秦，亦不及吴起。《汉志》兵家有《李子》十篇，沈钦韩曰：“疑李悝。”又有《公孙鞅》二十七篇，荀子《议兵篇》：“秦之卫鞅，世俗所谓善用兵者也。”是重兵事，又李悝吴起商鞅三人所同也。……人尽谓法家原于道德（道家），顾不知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移耳。

这段话说得相当清楚了。钱穆先生说我在秦劝说孝公开始用儒家之术，这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明确记载，只要你仔细看看，就可以清楚我对儒家的学术研究也是很精

深的。而我在秦国变法时采用李悝、吴起的办法，钱穆先生讲得十分清楚的。至于用兵，荀子的《议兵》篇未说李悝，实际他也是当时著名军事家。我在魏国时曾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管理家族事务的官员），他也是魏国著名的将领，应该说我的军事才能有一部分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至于钱穆认为我入秦后担任相，采用“李克、吴起之遗教为多”，这一论述不能说不正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私淑李悝是正确的，而且我还私淑吴起、公叔痤呢。

不过，从战国时期思想家们来看，学虽有师承，但也不是固守一说，甚至始于某家而终于另一家者多得很呢。孟子在《滕文公上》中不是提到陈相等人始师儒学而最终倒向了农家许行吗？至于韩非子在《和氏》中说我劝说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这在《商君书》和《史记》本传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商君书》中反对《诗》《书》的言论是有的，可参见《农战》、《靳令》、《去强》诸篇。在所谓儒法斗争的研究中，将这些言论作为依据，说我与儒家是泾渭分明，毫无干涉，恐怕是从政治需要来论述的。应该说，我早年研究过儒家学问，这一点，郭沫若先生的《十批判书》中的《前期法家的批判》“商鞅”一节中就说过：“商鞅是李悝的学生，与吴起同是卫人而年辈略后。他也是在魏文武二侯时代儒家气息十分浓厚的空气中培养出来的人物，他的思想无疑也是从儒家蜕化出来的。”坦率地说，我更喜欢“刑名之学”。刑名之学就是你们所说的法家的学问。我研究过李悝、吴起的学问，到秦国后，由于当时形势需要，我采用了法家观点来治秦国，批评过儒家观点，因而被后人确定为法家。

客问：商先生提到郭沫若先生的《十批判书》，我是拜读过的。我也注意到刚才您说的“商鞅是李悝的学生”那一段话，但不知郭先生是否有根据？

答问：这就要看如何理解了。说我私淑李悝，是他的学生，也不能说是错的。但有部著作进一步作了“发挥”，说我“由于卫国内乱不断，政治腐败，遂离卫去魏，拜李悝为老师，学习法家理论”（乔伟《中国法律制度史》第63页）。这就不知道作者是根据什么资料得出这一结论的。李悝在魏文侯时期任相，文侯死于公元前397年，按照钱穆先生的推测，我还没有出生呢！实际上，现存先秦资料中没有任何有关我拜李悝为师的记载，大概是两汉之际的桓谭《新论》说我带李悝《法经》入秦，被误认为是我拜李悝为师了。《唐律疏议》卷一说：“魏文侯师于里悝（即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恐怕也是被人误解为我师事李悝的原因吧。另外，童书业先生《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说：“商鞅的老师魏国宰相李悝所施行的平余政策，就已经含有抑制商人的用意了”（第36页）。童先生所指的“老师”一词比较含糊，他没像上述引文中明确说我“拜李悝为老师”，因此我就不作评价了。

客问：商先生，关于您的师承问题，在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还有这样的观点，说您“曾以鲁人尸佼为师，据说他在秦国当权时，如有所谋，都要和尸佼商量”（第378页）。蒋伯潜先生的《诸子通考》下编中的“法家之书——《商君书》、《韩非子》及其他”中认为尸佼是您门客。而现在大部分学者都不以为然，谈及先生的师承问题时都不及尸子。不知先生对此意见如何？